

## 第五章 初仕北京

作为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年轻的使馆参赞，初到北京，既在官宦中少有交游，又无官阶（虽为进士出身，只是功名，并无官职），不但囊中羞涩，且不谙京中风气，甚至连中式衣服也没有，更不要说官服了。我入仕京师，就是这样白手起家的。不过，在外务部的同事中，除了周自齐外，我总算还有几位相识。由于我未能及时抵京，刘玉麟先生已被任命为新闻处长，他后来曾任驻英国公使，我则为处中职员之一。另外有几位，大多是曾留学美国和英国的学生，也先于我来到新闻处，已开始履行他们的职责，接待外国新闻记者，协助出版英文《北京日报》（*The Peking Daily News*）。

根据 1901 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清廷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并由庆亲王奕劻为总理部务大臣，满人、大学士那桐为会办部务大臣。此外，还有会办大臣兼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左、右参议各一人。外务部下设四司，各司设有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二人，额外行走六人。另设有五股，分别为俄、德、法、英、日本。各股的成员，均为年轻的外交官，他们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学习过本处所要求掌握的语言，并且十分精通，专事口译或笔译。此外，还有中文秘书处和新闻处。前者由著名的学者组成，致力于特殊信函的起草等文字工作。后者，由于事属新创，职司重要，其成员都是一流的英语专家，享有特殊的地位，俸禄也较高。

外务部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学习或在驻外使馆工作过,由于受过同样教育,有着类似经历,彼此相处很和谐。即使是较高的官员,他们中有些人可能连一句外国语都不会讲,但思想也都比较开明,对外部世界较为了解,这与其他各部官员迥异。其原因在于,他们长期办理外国事务,与各国外交官经常接触。庆亲王一年中仅到部里一次,缘其身为内阁总理大臣,公务实在繁忙。大学士那桐则每周到部里一次,仅待一小时。因此,外务部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专任尚书、侍郎、丞参、郎中主持办理。然而,所有与驻外公使馆来往的重要信函,每天清晨都要送交内阁,供总理部务大臣和会办部务大臣详阅,以使他们及时了解正在办理中的外交事务。实际上,外务部的所有公文,无论备忘录还是急件,都要经由多人过目,舛误和疏漏几乎不可能发生。此乃部务办事程序的优越之处。我进入外务部时,梁敦彦正任尚书,他也是容闳当年率往美国留学的少年,曾在耶鲁大学学习过。两位侍郎,其中一位<sup>①</sup>多年在驻外使馆任职;另一位<sup>②</sup>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旧员。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特别是官场,除亲属关系外,还有两种很重要的关系,可以助人成功。一是同年,即在同年参加科考取得功名者(类似大学同学);二是同乡,即籍贯属于同一省者,如属同县、同一地区,则关系更加亲密。官宦之间,凭借这两种纽带,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提携、援引。第一种关系,完全靠情感维系。即使是在不同省分举行的乡试,中举者素昧平生,但只要是同年,他们

<sup>①</sup> 系指胡瞿德,历任使馆随员、参赞等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驻俄公使,三十四年(1908年)任驻日公使。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召回,授外务部右侍郎,旋改任左侍郎。——译者

<sup>②</sup> 系指邹嘉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外务部左丞署右侍郎,宣统元年(1909年)任右侍郎。——译者

就觉得彼此有着紧密关系，不但平时友好相处，而且在必要时，责无旁贷地相互支援。

此外，还有因系同年出生而结为友谊小团体的，这与中国人看重年代，认为同年出生者命运相系有关。在外务部，我遇到很多同乡，他们待我这个新来者非常好。在部外，我与来自松江府（当时上海地区属松江府）的官员过从密切。在旧日的京师，同乡之间建立有稳定的关系网：新人京的官员照例须请同乡证实他的籍贯和身分，并缴纳小额酬金。积存起来的款项，用作维修本省或本府会馆的费用，或在相关的同乡中均分。

尽管外务部待遇优厚，但我的俸银仍然不敷各项支出，不得不觅求兼差。其时，严复先生在学部任审定名辞馆总纂，我在他那里谋到一个职位。这与我的例行公务并不冲突，因为外务部午后才办公，我可以自由支配上午的时间。

外务部为部员提供免费午餐。当时的厨师是一个重要的员役，每月月底，俸银都由他发放。我们领到的是钱庄的银票，实际上使用的是白银，既有银锭，也有小额的碎银。当年流通的货币是银两，按白银的重量计值。我在京师任职，须购置整套的官服和一些礼服。根据清朝的礼制，将所有的服装准备齐，需要一笔很大的开支，因为，不同的季节要穿不同的服装，甚至每周都要变换服饰。衣服的面料必须有所不同，其种类有罗纱、丝绸、锦缎等。此外，衣服还有单、夹、棉之别。冬天穿的官服，选用的毛皮料就有五、六种之多，诸如白鼬、羔羊、狐狸、黑貂等。每种毛皮官服有时还须备有两件，其中一轻一重。置备齐全所有这些官服，最少也要数千两白银，这其中还不包括日常所穿的衣服。

京官中有慕虚荣者，常常买一孔雀翎戴在官帽上，或者花一笔

较大的款子捐个虚衔,为的是戴上更高品级的顶珠。我只穿迫不得已必须穿的官服,决不效法这些徒劳无益的愚蠢行为,更不会为图虚荣而花分文。遇有须穿珍贵毛皮官服的场合,诸如每年谒见亲王或进宫之时,只是找家境富裕的朋友借上一件。最初,我没有官品,仅为礼貌起见,在冠上戴一水晶顶珠。后来,升任参议,戴上了蓝宝石顶珠,但从来没有戴过孔雀翎。

我是第一个身为参议却舍弃骡车而乘胶轮人力车的人,在这一点上,我打破了京师官场的惯例。其时,即使所乘都是骡车,也因乘坐人的官品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参议乘坐的骡车,车帏的底边是绿色的。尚书和侍郎的骡车车帏底边则准许用红色,与他们所戴顶珠的颜色是一样的。此外,按照规定,品级高的官员到部里时,门吏须高声通报。由于我乘的是微末之员才坐的人力车,最初门吏颇为藐视,并不通报。后来,他们记住了我的官品,对我乘人力车也习以为常了,才开始高声通报。直到我购置了一辆马车,这些傲慢的门吏方对我毕恭毕敬起来。当时,只有大学士才有乘坐官轿的权力。轿子由四名轿夫肩负而行,步履如跑。另有准备替班的轿夫乘坐骡车,而非步行,尾随其后。

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兴办的。当时,该校正在筹建中。由周自齐和学部的范源濂担任总办和会办。由于周自齐在外务部的公务繁重,无法继续承担总办的工作,故推荐我接替他。每周我要去筹备处两次,地址在西郊清华园,离颐和园很近,距城 15 余里。从我的住所乘马车到那里,需要 3 个多小时。可是,出西直门,穿过田野,有一捷径可达。我向来务实,不讲排场,每次都租驴代步,在侍役的陪同下,走此近路,可节省一半的时间。

美国政府在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时，曾私下表示，希望这笔资金能用于派遣学生前往美国留学。清政府内部在派遣什么样学生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议。学部坚持认为，应派遣国学基础扎实的成年学生出国。外务部、特别是梁敦彦先生则主张，须选派年少者，以使他们能够彻底美国化。他解释道，只有树苗而不是已长成的树，才能经过适当的修剪，栽培成为需要的树木。他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至少派遣数千名少年到美国留学，将来学成归来后，全国每个行政区可分配一二名，由他们提出并实施地方的改革方案。他认为，由于外国的侵略，中国的危难迫在眉睫。如果不立刻进行彻底的改革，拯救中国将无望。显而易见，他的这些主张颇受个人经验和印象的影响和左右。因为当年他在容闳博士的率领下出国留学时，就是一位十二、三岁的少年。他对赴日学生的印象却很不好，认为归国的留日学生更像是政客，而非爱国的实业家；他们从来就没有受过现代观念的教育，也缺少民族主义精神。持不同意见者则担忧，年少者出国，会失去国民性，变为彻底的“洋人”；他们会丢掉中国的习俗、传统和学术知识，甚至可能会淡漠对民族文化的感情，缺乏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从而变成无法为国家效力的人，至少在他们归国后的数年中，会是这样。

有待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留学生对学习课程的选择，究竟应主要学习法律和政治还是科学和技术。鉴于留日学生蜂拥学习政治科学，回国后，除了想在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外，别无雄图；显然，留美学生所学专业，应使他们学成后能够参加国家的经济和物质的重新建设。只应有一小部分人学习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

如通常那样，这场争论也以取得一个折衷方案而告结束。于

是,成立了一个相当于高中程度的游美学务处肄业馆,旨在为选中的学生做好出国前的知识准备,学习时间为4年。在肄业馆尚未培养出学生前,先用考试办法选择几批学生,以供当下派遣出国之需。这些青年人来自各省设立的学堂,不过,当时这类学堂并不多,且教学水平很一般。

清华学校教学制度全面建立后,只有该校毕业班的学生被派遭到美国,停止了原来的校外考试。经由清华,前后有3000余名年轻人,其中包括一部分女生,在美国的大学里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归国后,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了重要的服务。美国也受益匪浅,他们的文化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对华贸易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他外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最初很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但后来,却纷纷效法,也取得了同样结果。

当时,《北京日报》(英文版)的编辑是李湛霖。1906年,他因主张中美相互理解,在美国颇受关注。他曾会见《纽约先驱报》的所有者贝内特(Bennett)先生,贝内特利用他的颇具影响的报纸,支持李的主张。当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然而,贝内特派遣奥尔先生为常驻北京的特别记者,通过他的努力,加深了北京乃至全中国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印象,李湛霖先生的文笔流畅,且北京仅此一家英文报纸,因而,他撰写的社论在国外颇受重视。北京还有中文《北京日报》,由报界耆宿朱淇主办。另有中文《顺天时报》,是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机关报。外交部新闻处成立后,其成员也为英文版《北京日报》撰写社论,有时还在报上发表有关外国事务的独家新闻,从而使这份报纸的地位更显重要。

其时,驻华美国公使为芝加哥律师出身的嘉乐恒(Calhoun),由于他具有民主态度和同情心,因此博得人们的好感。他与我们

这些在美国留过学的人来往频繁，甚至还与一些人结成牌友，轮流到各家去打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 Jordan）先生是资深外交官，对于我们这些擅长英语的青年官员也很客气。

作为外务部的部员，我有幸参加了朱尔典公使觐见宣统皇帝和摄政王、递交国书的仪式。公使及其随员乘坐明轿，由公使馆前往紫禁城，进午门，然后来到御书房。外务部的官员在这里接待他们。宣统皇帝和摄政王已在乾清宫升座，御前大臣肃立左右，他们大都为满蒙王公。宫外侍卫手执古代兵器，站立两侧。在外务部尚书、侍郎的导引下，公使沿着大理石板铺成的甬道，走向乾清宫。我们这些年轻的部员跟随在后面。在鸦雀无声的静寂中，只听得欧洲人皮靴着地的声音。步入宫殿后，尚书、侍郎等先在宝座台基前跪下，英国公使则向端坐于宝座之上的年幼的宣统皇帝行三鞠躬礼。隆重的仪式使殿内的氛围无比庄严，乃至见多识广的英国外交官在宣读祝词时，也不免声音有些颤抖。读毕后，他走上台基，将国书呈递于摄政王手中。彼此寒暄了几句，公使便退下台基，与其随从步出殿外。

外宾们回到御书房，这里已备好香槟酒和点心款待他们。稍事小饮和品尝，客人们即行告辞。整个觐见仪式也就结束了。外务部的部员把这样的活动当作举行盛宴的机会。因为事毕后，我们可以到东华门外著名的东兴楼饭庄，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费用全由外务部支付。

北京的住宅轩敞精致，但缺少现代的舒适，冬日里，屋内冰冷刺骨。外务部的主要官员，特别是年轻人，都在国外生活过，因此兴起了按照现代式样改造居室的时尚。他们在室内铺设木制地板，安放大型火炉，摆设洋式家具，悬挂厚实窗帘，还安装了电灯。

房屋之间，则用封闭的走廊相连。他们还雇用了西餐厨师和经过训练的仆人。这样做既为了生活的舒适，也为了应酬同事和外宾的来访，结果使得他们国际性的社交活动渐渐地多了起来。这种变化，一定会搅扰了已经过世了的顽固派的在天之灵。

在一家国际网球俱乐部，中外女士轮流担任主持人。通过这些活动，我国同胞与居住在北京的洋人之间的隔阂渐渐消除。由于国际交往的增多，北京的社会生活变得富有魅力。相互酬答的官方宴请，很是频繁。新落成的外交部建筑，厅堂宏敞，陈设华丽，很多盛大集会都在这里举行。越来越多的女士，包括满族皇室格格们，都对社交活动产生了强烈兴趣，活跃了京师的气氛。尽管北京赛马俱乐部的建筑规模有限，跑马场并不宽敞，可是，每次举行的比赛，都吸引了很多的观众。

对于在京的外国女士来说，最令她们激动的异乎寻常的事，莫过于国丧释服后隆裕太后和幼帝对她们的接见。我的妻子（这次接见发生在我们的婚后）和一位曾留学美国的女士担任翻译。接见在御花园的钦安殿举行。我和一位同事受外交部的派遣，先行至园内，查看接见仪式的细节安排。但在接见和赐宴之时，我们必须回避，因为不允许我们男士在隆裕太后和外国大使夫人们面前公开露面。当我们正站在水池边，等候外宾的到来时，太监们突然传呼道太后和幼帝驾到，于是，我们匆忙退入附近的空房内。透过窗纸，得以窥见圣上的御容。幼帝当时大约只有7岁，身穿全套朝服，朝冠上缀着一枚很大的东珠。

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不但数量多，且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要职，他们拥有一个富丽堂皇的俱乐部，我们经常借用，以招待客人。时隔很久后，在1920年代，我们这些留学欧美的人才在一座前喇

嘛庙里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在原址上，我们修建了花园、网球场和宿舍，把它改造成一座漂亮的建筑。在这里，我们接待了很多外宾，使其成为展示北京的窗口。这个俱乐部的修建费大部分都是由我们外务部的成员捐赠的。

在我们接待的贵宾中，有美国陆军部长迪金森（Dickinson）及随员，他们从马尼拉回国，途经北京。皇室亲王和外务部先后举行了盛大宴会招待他们。每次集会，宾主先后讲话，措辞得体，谦恭有礼。军谘处大臣载涛，系幼帝的叔父，在北京西郊万牲园，准备了丰盛的午餐，招待迪金森一行，指派我将他的欢迎词译成英语。在答谢时，迪金森的讲话词藻华丽，充满了比喻，表现了美国特有的夸夸其谈的作风。美国公使馆的一位参赞负责将其译成汉语，深感力不从心，十分窘迫，悄然嘱咐代其劳。

迪金森先生系美国南方人，虽属民主党，但参加了共和党的内阁。他参观了我国的军事设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迪金森一行取道西伯利亚前往欧洲时，我们三位分别受外务部、陆军部和军谘处派遣的官员，一直陪同他们到东北。东三省总督负责招待他们，送行到满洲里。迪金森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位波士顿富商，后来他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数月后，我们收到了他寄来的三块精美的瑞士表，上面刻有文字，作为纪念品。

尽管我已过而立之年，却依然单身，这种情况在中国实属罕见，但也有其原因。由于父母的去世，我无法按预期的那样在美国学习较长的时间，提前返回了家乡。但我抱定主意，要再度前往美国，然后再结婚。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才实现了这一夙愿。我任职于外务部后，成家的时机成熟了。恰巧此时，我在年轻时结识的翰林李公，住在北京，以介绍合适的女子给我为己任。他介绍的是山

东巡抚<sup>①</sup>的妹妹。这位山东巡抚曾担任过中国驻巴黎和驻柏林的公使，带着妹妹一同赴法国上任，在那里呆了两年。

孙的妹妹通晓法语，能说会写，熟悉外交礼仪，了解世界情势，诸方面都使我感到称心如意。当时，她和她的母亲、另一个兄弟、还有一个姐姐住在北京。按照习俗，结婚前我们不能见面，只有通过我的妹妹了解她的外表风度，并交换彼此的照片。那时我的妹妹在帮我照料家务，她可以在李家的茶会上见到她和她的家人。

订婚后几个月，我们在家中举行了婚礼。由于她没有受过洗礼，婚礼无法在教堂举行，但是有一位中国牧师按照基督教仪式在家中为我们证婚。我们穿着整套中式结婚礼服。有生以来，我惟一一次戴上了珊瑚红顶，这是新郎在婚礼中才享有的特殊权力。对于我国的传统结婚礼仪，我们一一遵照举行，诸如双方互赠礼品，新郎骑马至新娘家迎亲，簇拥着喜轿的迎娶队列，婚后第二天归宁新娘娘家，宴请双方亲友宾朋等。

我的妻家是一个旧式的显宦之家。她的父亲<sup>②</sup>曾经是光绪帝的师傅。他的长兄<sup>③</sup>与当时朝廷掌权柄者<sup>④</sup>是儿女亲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任命为外交总长，与俄国签署了关于蒙古问题的条约。1924年曹锟任总统，他负责组织内阁，我也是该内阁成员之一。

① 当时的山东巡抚系指孙宝琦（1867—1931），浙江杭州人。历任直隶道台，顺天府尹等。曾于1902年7月至1905年9月任驻法国公使，1907年4月至1908年9月任驻德国大使。1909年任津浦铁路会办。1911年，升任山东巡抚。民初在北洋政府历任外交总长、总理等要职。——译者

② 系指孙诒经。——译者

③ 系指孙宝琦。——译者

④ 系指庆亲王奕劻。——译者

1911年,我在外务部的首要任务是和英国代表谈判关于印度向中国输入鸦片的问题,谈判获得了成功,这对于先父力行禁烟的夙愿也可算有一个比较圆满的交待。英国的舆论被有关中国认真而坚决禁烟——包括禁种和禁吸鸦片——的报告所感动,强烈呼吁印度政府停止鸦片贸易,但是为了既得利益,印度政府对此无动于衷。于是,我方提出了一项逐渐结束鸦片贸易的计划,这个计划使得英国鸦片商的利润暂时不受影响。经过几周的谈判,在1911年5月8日,由英国的朱尔典和中国的邹嘉来签署了一项协议,使上述办法得以具体执行。

国外鸦片贸易的辩护者往往提出这样的借口:适量吸食鸦片是有益的,而且中国人对吸食鸦片表示赞同。这种论调荒唐无稽,有悖于事实。我本人听到的全是国人对吸食鸦片的交口谴责,就是那些吸食者本人,也对染此恶习追悔莫及。据说,有一些愚昧的母亲诱导儿子吸食鸦片,使他们丧失斗志,俯首贴耳,懒散地呆在家中,以免他们惹是生非,挥霍家资。这样的说法无法证实,可能与个别的满族没落户有关。毫无疑问,我们的政府应对此负很大的责任。起初,它没有努力禁绝鸦片贸易;后来,又时紧时松,查禁无力。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政府听任强权势力为所欲为,为了保护自己,政府甚至采取了倒行逆施的政策。有关铲除吸食鸦片恶习的严厉法令虽然不时地颁布,然而,执法部门却玩忽职守,全凭自己的好恶行事。

鸦片贸易愈演愈烈,吸食鸦片恶习屡禁不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鸦片能带来税收,这也是禁烟的最大障碍所在。当中国政府在禁止印度鸦片的输入上束手无策时,于是,就采取了所谓的保护性措施,以免全部利润流入外国人的腰包。政府开始允许国内种

植罂粟,以求在此笔不义之财中分得一杯羹。于是吸食鸦片的恶习在国人中迅速蔓延(我们实在无法逃脱这种可悲的事情造成的严重后果),征之于种植、销售和吸食鸦片的税款也由此大量地增加了,即使是正直的官员也难以抵御这样的诱惑。由于中央与地方的预算开支越来越大,同时还得负担沉重的对外赔款,各地官员无不感到财政拮据。我们知道,一种赋税既经征收,便很难取消。关于鸦片税,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这是对邪恶征的税,因而,征收再多也不为过。没有人愿意轻率地出来反对此种无限扩大的税收。中国政府官员称其为“寓禁于征”。尽管进口鸦片的税额在条约上有所规定,但中国政府基于多年的经验,提高税额的举措得到了国际的谅解,并未招来违约之嫌。

1900年以后,变革的精神深入人心。许多明智的爱国官员极欲废止祸国殃民的鸦片种植和吸食。其中一人,便是唐绍仪先生。他留学美国,也深谙本国国情。他曾被派往印度,始终密切关注着鸦片给中国和印度造成的危害。他是一个天生的反对非正义与压迫的斗士,领导了反对鸦片贸易的运动。唐绍仪成为政府中有突出影响的一位官员,并被视作外交事务中的领导人物(禁烟竟成为当时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他的忠诚和勇气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由于他的坚韧不拔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成功地集合起一批有影响的朋友和同僚,共同反对鸦片贸易,甚至怯懦犹豫的满族大员,也倾听他的意见。因此,1906年8月,禁烟上谕得以颁布。上谕规定:10年内,无论进口鸦片还是本国烟土一律彻底禁绝。同时中央和地方各官员得到指令,筹措新的税源以代替鸦片捐。

当时,上谕尚有莫大的权威,政府各级机构立即开始行动,由于禁止了罂粟的种植,鸦片的产量急剧减少。各省巡抚竞相禁止

鸦片的种植、贩卖和吸食。即以曾大量种植罂粟的陕西省为例,由于巡抚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三年之内罂粟种植几乎完全绝迹。我国人民一向重义轻利,这次禁烟就是最好的说明。一旦他们深信鸦片造成的祸害必须铲除,政府上下官员便将税收的损失视作微末之事。

1907年,中英两国政府达成谅解,双方同意从1908年1月开始,输入到中国的印度鸦片,三年内每年削减10%。如果在此期间中国政府能够减少本国鸦片的种植与贩卖,英国政府将继续以每年10%的比例削减输华鸦片,直到1917年完全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英方的让步,一方面迫于其国内舆论的压力,当时越来越多的人反对英国进行这种臭名昭著的贸易;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他们也想拭目以待中国政府的禁烟措施。1909年12月,我国政府颁布了禁烟法令的细则。实际上,根据当时各省的报告,禁烟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细则的公布只是为了使禁烟运动更加有章可循和划一。

由于实施禁烟,各省官员不再严格地按照条约规定的税率对印度鸦片征税。因为在禁烟运动中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对鸦片课以重税,以使穷人无力购买。在这样做时,显然不应该也无法区分本地产鸦片还是进口鸦片,只能对二者都课以重税,才能收到禁烟实效。英国人认为这么做违反了条约的规定,向外务部大臣提出抗议。但是,这种作法也表明中国人的思维,主要受道德的支配,而不是出于严格的法律和财政上的考虑。外务部的答复总是诉诸道德意识,使英国政府在道德的压力下,不得不容忍这种字面上对条约的违背。外务部也非常明智,深知大英帝国绝不会再为鸦片贸易而发动一场战争。

有关禁烟形势的概况已如上所述。英国政府根据驻华领事和教会人士的报告以及使馆商务参赞巡视各省的所见,认识到中国政府禁烟决心和措施的得力,遂决定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并建议举行谈判,结束印度经营的鸦片贸易。

如果看一看 1911 年中英签订的“禁烟条件”,我们可以发现英国的一些动机,认识到条约的一些特点。首先,英国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例如声称如果中国用自己的鸦片代替印度鸦片,则英国绝不终止鸦片贸易。其次,英国所做的各种“让步”要视中国禁烟的进展,同步落实。因此,中国各省只有当罂粟种植完全禁绝,并且不输入他省鸦片时,印度鸦片才会停止运入。为了避免印度鸦片贸易被骤然停止,遂有第三款的规定,即上海和广州应依旧对印度鸦片开放,直到中国的禁烟计划已全部成功地实施,这两个港口才可最终停止鸦片贸易。人们不会忘记,广州和上海是印度鸦片的两个最重要的集散中心。

条约中还有对外国鸦片征收统一税的条款,规定该统一税须和对中国本土鸦片所征收的税保持一致。新的税额规定为每 100 斤鸦片纳银 350 两,比旧税提高了三倍多。尽管如此,由于旧税在征收当中,不论进口鸦片还是本土鸦片,都由地方当局额外增加了许多附加税,所以实际上新税比旧税并未增加多少。中国政府预见到随着鸦片进口的逐渐减少,印度鸦片的价格会大幅度上涨,于是提出以从价税代替固定税,每三个月或六个月调整一次税率。然而,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复交涉,拒绝接受这一建议。“禁烟条件”公布后,印度鸦片的价格如预期的那样飞速上涨,中国政府损失了巨额的合法税收,英国鸦片商人却大发横财。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使印度政府每年获得 200 万英镑的利润,这个数目相对来

说微不足道，然而却让中国政府花费了数年的谈判时间，做出了巨大让步，才使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得以终结。

此时，外务部左丞施肇基先生和我在北京组织并主持满洲防疫处的工作，任务是消除正在东三省传布的肺鼠疫<sup>①</sup>。设在东北当地的防疫事务所由伍连德博士主持，他是曾留学英国的中国医生。他领导着一个庞大的医疗组，其中许多人来自北京和满洲的教会医院，为疫区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有时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成功地制止了鼠疫的传播，如果疫情在当时得不到及时的控制，将会引起外国干预。成千上万的人在此次瘟疫中丧生，对尸体的处理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当时，土地已冻得十分结实，棺木也不敷使用。天气尽管异常寒冷，却不足以杀死细菌。即使将尸体埋入土中，也无济于事。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将尸体集中起来火化。但是这种作法在我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势必会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惹来对防疫部门的攻击，使他们出色的工作遭到物议。然而幸运的是，我们使朝臣们和开明的摄政王摆脱了偏见，终于颁布了上谕，批准了采用火化办法，保障了防疫举措的实施。后来，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防疫会议”，来自各国的代表聚集于此，讨论瘟疫及其预防措施问题。中国因此次扑灭瘟疫的成功获得了赞赏，这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召开这样的国际会议。

德国皇太子在环游世界的途中，将对中国和日本进行访问，为此我国政府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位经验丰富、办事干练的大臣负责此项事宜，他奉命重新装修一处皇家官邸，以此做为德国皇太子

① 此事发生在宣统二年(1910年)冬季。——译者

的下榻之处；他还致电德国柏林皇家工厂，订制了贵重的瓷器和全套镀金餐具。不幸的是，满洲突然发生鼠疫，德国皇室深恐有碍皇太子的健康，遂取消了此次访问。然而这些准备并没有白费，订制的餐具在多次国宴中派上了用场，包括款待法国霞飞将军<sup>①</sup>、瑞典王子以及其他来访贵宾。

1910年，盛宣怀先生接替唐绍仪先生出任邮传部尚书，次年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600万英镑贷款的合同（必要时可增至1000万英镑），以为修建湖广（汉口—广州）铁路筹集资金。我和一位同事代表外务部负责检校合同文书，特别是核查中英文本是否相符。在工作中，盛宣怀先生的睿智和魄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不懂英文，但却能立即抓住我们提出的修正案的要点。他是我国近代历史中最富智慧的官员之一。他倡导并支持了大量的改革措施，涉及铁路、电报、轮船航运、矿业、纺织等多种企事业。

虽然我在外务部任职有年，但是升迁的希望渺茫，因为我没有实授的官职。这年，清廷为已取得进士或举人出身的归国留学生举行殿试，我也得以参加。殿试在紫禁城的保和殿举行，当时正值酷暑季节。我们全都身着常朝服，一些人还须在帽子后面缝上假辫子。大家在拜垫上盘膝而坐，身前放置一张矮小的书桌；根据古代经书上的一个题目，每人须写一篇策文。监试官中有不少的王公贝勒。其中有一位蒙古亲王，与我很熟识。当他注意到我们身着朝服、头顶冠戴、又不惯于席垫而坐、酷暑难耐的样子，便慈悲大

<sup>①</sup> 霞飞(Marshal Joffre, 1852—1931)，法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法军总司令(1914—1916)。——译者

发，准许我们脱掉帽子。于是，巨大的红色殿柱上，挂满了缝有假辫子的帽子，殊为可笑。

尽管殿试非常庄重，是正规的专门策问贡士的考试，实际上，只要字体工整，策文没有大错，浅通论述的题目，便不难过关。我们这些已取得进士出身的人，试后被分别授为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其他人或为部属主事，或分发各省，用为知县。我被授为翰林院检讨，取得了在各部任左、右丞的资格，不久即被任为外务部参议。

清代有关接受新翰林入院的仪注，非常详尽，因为翰林是那个时代读书人追求的最高荣誉。官方修订的翰林院典章，即有六卷之多，记载了它的历史和条例，以及翰林的权利和待遇。当拜访非翰林出身的官员时，他们有资格使用红色名刺，上书大字（按中国官场旧习，名刺及所书字体的大小，与其官阶的大小成正比例）。在地方上，当翰林拜访督抚时，虽然由侧门入，但当他们告辞时，督抚必须开中门相送。如果拜访翰林前辈，则不可用红刺，而代之以白刺；所持态度和称谓，则视他们参加科考的年代相差多少，有所不同。

法国科学院有关接受新院士的仪注不能不说已极详备，但与清朝翰林院相比，则简单多了。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清朝的学者倍受尊重，无论在社会上还是政治生涯中，都占有最高的位置。清朝官员去世后，只有生前曾是翰林者，才有资格在谥号中用“文”字。例如，曾国藩谥“文正”，意为“博学、正直”；李鸿章谥“文忠”，意为“博学、忠诚”。北京孔庙立有大量的石碑，镌刻着翰林院从几个世纪前建立以来所有进士的名字，使他们流芳百世。

1910年有两件关系国家内政的大事值得一提。一件是汪精

卫因谋刺摄政王载沣而被捕入狱(但他没有被立即处死),他在摄政王进宫时必经的桥下放置了炸弹 另一件就是由贝子溥伦任总裁的资政院的正式成立。资政院只有议政权(与 30 年后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相类似),仅为召集国公会作准备。资政院每年会期为三个月。它的创立显然是变法思潮的结果 当年,康有为领导着一批年轻人成功地使光绪皇帝相信,迫切需要进行政体的改革。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激进措施吓坏了慈禧太后,她惟恐失去了权力,在她的反对下,戊戌变法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这就是历史上的 1898 年戊戌政变。

义和团运动后,国人要求改革的愿望日益强烈,尤其呼吁实行宪政,遂有 1905 年五大臣赴日本、美国和欧洲考察立宪政体之举。五大臣返国后,连折奏报考察结果,呈请朝廷实行君主立宪。一年后,清廷颁布上谕,宣布以十年为期,准备实行立宪(如同国民党所主张的训政时期)。同时改组国家机关,通过废除或合并某些部门,简化行政机构,使其现代化;还起用了一些较为开明、睿智的官员,代替顽固守旧者。

1908 年,清政府公布了各省谘议局成立章程,以及议员的选举条例。同年,还颁布了宪法大纲。尽管这些措施很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却未能满足国人的愿望。人们执着地认为,只有立即实行宪政,才能拯救中国;而且,人们已经不再相信清朝统治者的种种许诺。显然,当时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清王朝面临着摇摇欲坠的危机。未来的国会议院已选定在东城贡院旧址上兴建。然而,刚刚破土动工,就已注定了这项工程将无法完成。1911 年秋天,确切地说,是 10 月 10 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新军协统黎元洪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国会议院的建造渐被遗忘,工程从此

夭折。

人民对清政府的积怨已深。其中尤其令人民不能容忍的是，清朝统治者无力抵抗外国的侵略，致使国家蒙受奇耻大辱。慈禧太后推行的反动政策（与光绪皇帝的革新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导致民族灾难日深，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及屈辱的1901年条约的签订。除了这些原因为外，清政府的垮台也有其近因，而这个近因则是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随着1900年的渐渐远去，那些由于明显的原因而隐退的满清权贵，又露出头来，占据了政府的要职。摄政王载沣为人平和，但柔弱、没有经验，与独断专行、善权变的慈禧太后不一样。在多事之秋，他绝非驭国之才。袁世凯及其亲信被黜免，也削弱了清廷的力量。1911年上半年，仿照现代国家的模式，清廷改组政府机构，其组成如下：庆亲王奕劻任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任协理大臣，梁敦彦任外务部大臣，肃亲王善耆任民政部大臣，镇国公载泽任度支部大臣，唐景崇任学务部大臣，荫昌任陆军部大臣，贝勒载洵任海军部大臣，绍昌任司法部大臣，贝子溥伦任农工商部大臣，盛宣怀任邮传部大臣，寿耆任理藩部大臣。以上13名内阁成员中，有9名是满族人，只有4名是汉族人。此外，还有一位郡王衔贝勒载涛任军机大臣。这样的满汉人选比例，明显地违背了有清以来的惯例。尤有甚者，内阁中竟有多位皇族成员，更是与宪政精神大相径庭。这些皇族大臣，既缺乏经验，又无才能；只不过是年少纨绔。他们虽然仪表堂堂，却难以承担社稷重任。

随着各条新铁路的修建，铁路交通愈发重要起来，再加上1906年邮传部的成立，铁路国有化的政策被提到议事日程。李鸿章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时，曾最早倡导兴修铁路，得

到了广东籍官员和幕僚的强有力支持。但是后来，江苏籍的盛宣怀担任了铁路总公司督办。1906年，以唐绍仪为首的广东帮复从盛手中成功地拿回了对铁路的管理权。事实上，邮传部尚书的职位被视作肥缺。他不仅掌握着大笔的贷款和税收，而且管理着铁路沿线数以千计的雇员。此外，官办邮政、电政，也统归邮传部执管。在路政管理中形成的分别以盛、唐为代表的江苏、广东两系，交怨不和。由于袁世凯的下野，唐绍仪失去凭依。1910年冬，盛宣怀东山再起，接替唐绍仪，担任邮传部尚书。他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特别是在路政方面，只允许私人公司修建无关紧要的铁路支线。这一政策后来通过上谕的形式，予以明文颁布。

不幸的是，衰落的清王朝已无法使国人接受这一很不得人心的政策。正是有关路权的斗争，直接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当时，湖南巡抚代表省谘议局上奏朝廷，陈说湖南人民有能力集资修筑湖广铁路在湖南境内的路段，而不需要任何贷款（指四国银行团的贷款）。结果，遭到清廷斥责，不予钦准。实际上，铁路经过的四个省份，全都反对外国贷款和赎回现存商股的办法。

四川人民反对四国银行团贷款的斗争更是激烈，清政府调遣军队进行镇压，终至发生冲突，民众有多人被打死。四川省的一些著名绅士，包括川汉铁路公司总经理、省谘议局议长和议员等，被逮捕拘留。这一系列的保路斗争发生后不久，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

同年在拉萨，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联豫发生了严重争执。达赖指称联豫卫队行为不当，虐待抢掠当地居民。联豫和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被迫逃离西藏，达赖喇嘛竟然就此宣布独立。清廷颁布上谕，废黜达赖喇嘛，命重新选立。为了恢复拉萨的秩序和政府

机构，清廷已决定派周自齐出任驻藏大臣，周氏则拟推荐我为帮办大臣。正在此时，武昌起义爆发，这些安排也就作罢了。